

The Details Of History

历史的细节

马镫、轮子和机器如何重构中国与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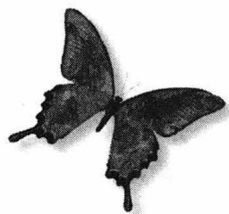
杜

上海三联书店

The Details Of History

历史的细节

马镫、轮子和机器如何重构中国与世界



杜君立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的细节 / 杜君立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3.4

ISBN 978-7-5426-4088-8

I. ①历... II. ①杜... III. ①世界史—研究
②中国历史—研究 IV. ①K107②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5884 号

历史的细节

著 者 / 杜君立

责任编辑 / 叶庆 李珏

特约编辑 / 罗乾熠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任中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版 次 /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 × 1000 1/16

字 数 / 260 千字

印 张 / 23

ISBN 978-7-5426-4088-8/K · 208

定 价: 39.80 元

题 记

历史是“时光老人”在过去年代的无数领域中间修筑起来的巨大的“经验之塔”。要爬上这座古老建筑结构的顶端以便一窥全貌确非易事。那里没有电梯，但是年轻人的脚步很强，可以最终达到目的。在这里，我把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交给你们。等你们回来的时候也就会明白，我何以如此热心。

——房龙

自序：历史的终结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很多年以前，因为“历史的误会”，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卷入了一场“历史的纠葛”，他留下了这首绝命诗和一篇《多余的话》。这个人就是瞿秋白。这首诗乃是集唐人诗句而成：第一句来自韦应物，第二句和最后一句来自郎士元，第三句来自杜甫。对现实来说，知识分子是多余的；对死亡来说，思想是多余的；对一本书来说，“序”是多余的——“多余的话”。人类发明语言，与其是为了沟通，不如是为了解释；如果说书是对人生和世界的解释，那么序就是对作者和作品的解释。对一个向死而生的悲观者来说，人都会死去，唯一的区别是留下什么；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他只能留下一份“遗书”，这就是所谓的“作品”。对这个世界来说，无论富贵、权力与荣耀，还是苦难、悲伤和耻辱，所有的一切都会随风逝去，只有历史会留下来。瞿秋白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疑问：“人如果有灵魂，还要这个躯壳干什么呢？人如果没有灵魂，有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呢？”对人类来说，或许只有死亡才算得上是唯一一个严肃的问题。乔布斯说：“死亡是生命最棒的发明。”面对死亡，哲学诞生了，进而也就有了历史。正如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所说：所谓历史，就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

一 从知识到智慧：现实的局限与理解的困境

某种意义上，人的一生意味着成长与进步。作为中国古代的智者，孔夫子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当我离开三十走向四十的时候，也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就是思考与解释。我至少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为什么这样，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正如伏尔泰所说：“我想知道人类由野蛮到文明的每一个细节。”如果我有幸能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不惑”吧。我和王小波一样，“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一种历史情结，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说：“人类的智力不能掌握着一切整体现象之起因，但是企望发现这些起因的需求却萦绕在人类灵魂之中。”我试图去理解哲学与宗教，虽然我不是一个像样的读书人，更谈不上虔诚。一个人一旦开始介入思想，困惑总会随之而来，每一种事情你总会得到无数种不同的解释。“人可以通过对事物原因的理解而获得自由”，世界如同草木生长，你只能看到其结果，却看不到其过程。其实，人的智慧永远难以超越他的生命。因为寿命和经历的局限，所谓“智慧”往往只是一时一地的见解。今天的人们既然不比古人活得更为长久，因此也绝不比古人更加智慧。如果说今人与古人有什么不同，那么或许是信息拥有量的剧增。

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理论上每个人都拥有全球的图书馆，这种海量信息足以使现代人比古人占有更多的知识。斯塔夫里阿诺斯曾说：“现代人所取得的一项杰出成就就是对过往历史的研究和再现，而古人对在他们之前发生的事情则知之甚少。”古希腊时代最无偏见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甚至断言，在他所处的时代之前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信息的短缺使他无法得知雅典无与伦比的辉煌和贡献。老子说：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信息并不代表知识，知识也不代表智慧，就如同财富并不代表幸福，因此现代人并不比古人更智慧，我们占有的知识依然很少，甚

至连常识都如此匮乏。事实上，我们并不比修昔底德做得更好，现代人与古人面临着许多同样的困境，其中之一就是信息短缺——我们并没有因为信息泛滥而实现信息满足。常言说过犹不及，信息过剩导致的“淹没效应”使真正有效信息依然稀少，虽然这种相对信息匮乏与古代的绝对信息匮乏不可同日而语，但信息的短缺状态依然存在。或许正因为如此，人类好学的美德才得以传承。

正如波兹曼的悲观预言，在一个“娱乐至死”时代，与其说我们面临着奥威尔困境，不如说进入赫胥黎陷阱。奥威尔担心信息被剥夺，赫胥黎则担心有效信息被淹没。面对新技术引发的海量信息，我们最迫切的需要或许已经不是创造新信息，而是发现真正有效信息。因此说，在一个信息过剩时代，对信息的梳理和整合显得非常重要，作为一个信息整合者比一个信息创造者更有意义。从内心来说，与其说我是一个写作者，不如说我是一个读者。“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我只是想通过对海量信息的遴选、梳理与分析，最后集腋成裘，整合出一些有趣而新鲜的有效信息，而这些“信息”和“知识”正是我所喜欢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认真的作者，但却是一个好奇的读者。在一个娱乐和低智的时代，英雄与权谋假历史之名大行其道，这里常常没有真正的“历史”。失望的结果，便有了这本《历史的细节》。我常常这样想，发明文字乃至违反人好动的本性去写作，或许都是出于一种不得已的结果，借用孟子的话来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据说，人类文明史上有三次里程碑式的革命：第一次是火的出现，人类超越了动物；第二次是农耕的诞生，人类超越了野蛮；第三次是写作的出现，人类超越了自己。同样，写作也经历了三次革命。最早的写作是巫师的专利，意味着神圣与神秘。国家的出现使写作成为一种统治方式，写作必须经过权力的许可，因此出现了图书审查、焚书坑儒、文字狱和敏感词等等写作灾难；官方垄断的写作构成一种成功的统治技术：宣教——洗脑——愚民。互联网的出现成为写作的第三次革命，它从根本

上解决了人类信息短缺的问题。互联网使人类超越信息，将信息更容易地转化为知识。“你可以在有些时候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候欺骗有些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时候欺骗所有人。”林肯的这句名言在今天变成了现实。互联网使写作突破了“巫师”和官方的垄断，写作不再是“作家”和少数人的特权，写作也不再是一种特定的职业；甚至说，一个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是可笑和不可思议的。

在文字时代到来之后，QQ与短信的普及使人与人之间的对话逐渐向写作与阅读转变，短信式的微博已经彻底消除了公共写作的门槛。在互联网创造的信息时代，写作成为一种体现人类智慧的公共文化活动。随着传统媒体走向式微，在扫除了传统写作的各种障碍之后，写作已经成为一种大众化的自然现象。写作就如同吃饭说话一样回归本能，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人既是作者，也是读者。“大众写作”与互联网强大的检索功能形成了现代社会特有的“长尾效应”，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众”都可以迅速得到自己需要的信息和知识，“真相”离人们越来越近，这使人类走出政治制造出来的孤独与孤立。互联网这个新媒体使每一个人都有参与历史写作的可能，启蒙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人类正从“自然人”和“经济人”走向“社会人”和“历史人”，而精神自治永远是公民自治和社会自治的基础。

在以前的启蒙年代，我们都读过质朴优美的《落花生》。作为这篇美文的作者，出生于台湾的许地山其实是一位优秀的宗教史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在1934年出版的《道教史》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此本不能说是著作，只将前人及时人研究的结果总撮起来，……全书创见极少，成见也无，不完不备，在所难免，望读者赐教。”我感到荣幸和惊喜的是，这句话如果用来作为这本书的序言竟也是颇为适合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本雅明曾经梦想写一本完全由引文所构成的著作，对马克思的思想和著作进行重新分析和组合，就像电影技术蒙太奇那样，通过自己独特的剪切与重新组织，既使原先重要的信息得到确切的保留，而且表达方式的变化会使人发现一些新的信息。“知之

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钟子期与俞伯牙、金圣叹与施耐庵、脂砚斋与曹雪芹，我不知道，从读者到作者的距离有多远，但至少有一点，就是那种对知识、智慧和审美的特殊嗜好都是一样的；这甚至不能用学术和体制的语境来定义，它更多的来自热忱、兴趣和性情，这完全发源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现实的困惑应当是许多人在走出故乡和童年之后的共同体验。正是这种无法回避的困惑，使我开始观察这个世界，进而“被迫”去阅读。在涉猎了诸多门类的一般知识之后，这种困惑并没有减少，现实仍然那么“不可思议”。直到有一天，我开始进入历史，眼前这个世界才突然之间豁然开朗：万物皆历史。我如同一个手持票根的乘客，坐在一列飞驰的列车上，我不懂我手里的票根是什么东西，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坐在这里，更不理解列车为什么飞驰。这一切迷茫与困惑，只有当我知道了这辆列车的行程以及自己从哪里上车、从哪里下车之后，才变得顺理成章。这或许就是历史的意义。正如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所说，我们都是过去的产物，我们之所以是我们，因为我们有历史。

二 从故事到历史：后传统时代的“历史”蝶变

中国启蒙思想家龚自珍曾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他还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佛家认为一个人有“三生”：前生、此生和来生。历史就是这样的东西，它会告诉我们关于“前生”的故事。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认为，一个人如果不了解自己出生前的事情，就等于永远没有长大。正是从进入历史的那一刻开始，我才读懂了我身处的这个世界。人的寿命只有区区数十年，而世界却已经延绵数千年；与世界相比，人的智慧几如萤火之光，然而历史却使人类的智慧超越了生命的限制。人会死去，但历史永恒；因为历史，文明不仅诞生了，而且文明得到了传承。

蝶梦不知他乡客，烂柯方忆旧时人。历史是不朽的，但历史并不是

静止不变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的序言中说：“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在岁月的长河中，飘满无数叫作“历史”的船。

在我看来，历史有三种。第一种历史是故事。“故事”二字的本来意思就是“过去的事情”，也就是历史。在中国古代，故事、历史与小说，这三者之间常常并没有明显的区隔。在英文中，历史（history）与故事（story）是同源词；在法语中，历史与故事则是同一个词。人是一种喜欢“有趣”的“故事”的动物，这其实也是大多数人喜欢历史的原因。在眼下这个漫长的后文盲时代和前文字时代，类似“故事会”和“评书”那样的历史故事总是大众最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从社会层面来说，历史就是成年人的童话，比如把一个皇帝杀人放火的历史讲成一个包工头发家的故事，把一场血腥的征服战争演绎成一场街头混混的打斗……

第二种历史是考据，这是很多专业历史学者所擅长的工作。在血雨腥风的文字狱时代，中国诞生了最著名的乾嘉学派。这种流风弥漫至今，仍然构成专家历史的主流；在他们看来，历史就是曹雪芹的母亲姓什么，李莲英几天洗一次澡，“苗”字有几种写法，祥林嫂是上吊死的还是跳河死的……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指出，考据只是治学的工具，而不是学问，好比舟车对于旅客。中国考据学源远流长，但却没有创造考古学，而是诞生了阿里巴巴寻宝式的古玩收藏之风。与其说人们看重的是历史，不如说是因为奇货可居。

第三种历史是解读，这是最少人做的事情。对历史的解读需要并不是多么复杂的事实和神秘的证据，而是分析与剖析。这完全来自于一个人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思想逻辑能力。《万历十五年》之所以成为标杆性历史著作，就是黄仁宇率先以西方历史学常用的方法论来解读中国史。在一个仍以故事与考据为主的中国历史江湖中，这种建立在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军事史、科技史、文化史等诸多学科知识之上的缜密解读令人耳目一新。读者不仅看到历史的大势，也看到了历史的细节，同

时还体验到了思维的乐趣。历史在一个完美的解读下，顿时成为一场思想的盛宴，这才是历史的真正意义所在。

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历史不是花边故事，历史也不应当是简单的史料，历史是一种加工与创造。真正的历史应当厚重典雅，而不是插科打诨哗众取宠。如果历史只是一种事件记录，那么叫“档案”则更为合适。从传统旧历史到现代新历史，中国似乎尚未完成这场历史转换；甚至可以说，历史在中国仍然处于“扫盲”阶段，历史只是“娱乐”的一种，一个真正的“历史”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作为超越时间的文明载体，历史面对的永远是未来；从这一点来说，历史是值得敬畏的，特别是在一个缺乏敬畏之心的无神中国。

历史从故事到思想的变迁，实际是从文学到哲学的过程，这一形而上的提升使历史从经验衍变为一种智慧。“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按照范文澜的看法，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来说属于“史官文化”。中国传统上缺乏宗教色彩，历史与天理就成为中国式宗教。“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历史不仅意味着至高的智慧，甚至成为一种神圣的意识形态。历史使一个缺乏宗教情怀的中国人超脱了生命价值的限定，相信一种永恒的正义与道德。立德立言立功成为中国人自古以来最大的人生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忍辱负重写作《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事实上，不仅文天祥这样的仁人志士崇拜历史，就是平庸如明英宗，也对历史充满敬畏。他在“土木之变”中被蒙古瓦剌俘虏，瓦剌首领也先以妹相许，英宗坚决拒绝——汉人天子做胡人女婿，史书上会留下“千古骂名”。应当承认，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的神性；为了尊严与名誉，一个人是可以放弃生命的。

正如梁漱溟所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几乎没有其他文明比中国更富于“历史”传统。在中国传统中，“史”是一种负责记事的古老的官职。文字的诞生常常也是历史的诞生，《说文叙》云：“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迹之迹，初造书契。”正因为这种官方色彩，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所谓历史其实就是宫廷史和权谋史。按照鲁迅的说法，是帝王

将相和伟人的家史。这种历史观一种占据着中国历史主流，从历史诞生的那一天起直到今天，所谓的“正统”依然没有松动的痕迹。在西方文化主导的现代历史学中，历史常常以文明史的面目出现。基于一种普世的人类文明视角，对历史的文化学解读构成一种平民化的“新历史”，这有别于中国式权谋的“旧历史”。如果说易中天的《品三国》和吴思的《潜规则》依然是“旧历史”的继续，那么从房龙的《人类的故事》、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到彭慕兰的《大分流》，历史早已呈现出另一番模样：比起皇帝有几个嫔妃来，我们更关心从前的普通人——或者说我们的祖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有过什么样的想法……毫无疑问，后者离我们更近，就如同猴子比乌龟更接近人类。如果说前者接近有趣的传说故事，那么后者才属于真正的历史。在旧的历史传统中，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就是现在的历史；而在新历史中，历史就是现在的政治，“撇开政治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

“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这是《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据说蜉蝣朝生暮死，寿命很短，其实人的寿命也并不比很多动物更长；但因为人类拥有历史，这使人类拥有了远远超过其生命限度的智慧。每一代人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他们的智慧是所有前人智慧的叠加。历史就是人类的基因图谱，它保存着人类的身世和所有生存记忆。历史赋予人记忆，也赋予人“身份”。历史不仅包括政治史、战争史、制度史，也包括社会史、经济史、生活史、文化史、民俗史和心灵史。在某种意义上，历史构成人类文化的思想核心。当文化遭遇政治时，历史就被权力改写；历史变成权力史，或者宫廷史政治史阴谋史。权力的阴暗必然使历史走向阴暗，甚至彻底消灭历史——“欲亡其国，必先灭其史”。

“五经皆史也”，中国无疑是一个极其“历史”的国度，事实上却面临“历史”的贫困。所谓“正史”常常被权力篡改为“秽史”，反而是民间的“野史”流传更广。这种野史导致小说的滥觞，毕竟人是历史最重要的载体。作家余世存批评道，我们的历史写作绝大多数是才子佳人之作，是帝王师将相帮闲之作，是或躲在书斋或上了电视的光鲜的学者大师之

作，却少有一个现代精神、气魄、理性统一的中国人之作。从这种意义上，在当下中国的“历史热”中，既不缺乏权谋史和名人传记的“励志”智慧，也不缺乏“戏说”和“恶搞”的“娱乐”故事，而是缺乏真正的历史——构筑在思想、理性、良知和智慧之上的平民史和文明史。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指出：中国当下“最大的毛病即是硬化历史”，要解决今日中国的问题，“就是要多读历史”，“首先要开放历史”，“今日遮蔽往事，只有明日的失望”；“历史不仅是镜鉴，而且是进入行动之出发点，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公众能接受之历史，等于让亿万人之行动出诸暗中摸索”。

三 从中国到世界：历史的贫困与历史的终结

在西方语境中，“历史”并不是一个好词，历史必然包括污点与批判，正如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它完全符合西方的历史价值观——“无分国别，人类历史都是自由的历史”（克罗齐）。对于现代中国而言，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于“中央之国”的传统时代。作为人类一分子，每个中国人首先是一个人，是地球公民，因为我们已经置身于一个全球化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文化首先属于人类文化；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所谓历史，应当首先是人类共同的记忆，人类史才是真正的“大历史”。黄仁宇在《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写道：“人类的历史既已逐渐一元化，以前历史家从短距离近视界所作的，自此可以因为新的事实存在或强调而更具体化，或予以增减而使之更符合时代”；“从全人类的历史着眼，不受国籍领域的限制，否则即不可能成为大历史”。毫无疑问，这是全球化时代赋予历史的新定义。

从传统意义上，中国历史就是集权的历史，“假设没有这样的中央集权，我们的大多数的祖先都已不能生存，遑论及我们后代”。因为地理与统治的封闭性，中国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体系；正如黑格尔所说，中国是世界的“例外”。这种封闭性不仅令中国文化自成一统，也使历史在中国形成独特的样式。这种“中国特色”的历史不仅以宫廷权谋为主流，而

且缺乏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背景，似乎中国完全独立于世界而存在。从大历史的视界来看，这种历史算不得真正的历史，而只是“中国志”而已，因为它完全是停留在中国视野内的一种“地方志”写作。

法国学者阿隆认为，人类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已进入“世界史的黎明”。随着交通、通信和信息等技术的日新月异，世界越来越扁平化，人类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地球村”时代。人类世界不分畛域，同呼吸共命运。事实上，这种“全球化”并不是今天才有，从人类的起源和扩散，到文化技术的传播和交流，人类历史其实就是全球化的历史。离开全球化的人类发展背景，就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历史，而只有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地方志，即局部的历史或者历史的局部。正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所言，“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此“天下”完全可视为现在的“世界”。这才是历史的全局。

从根本上来说，历史不是讲故事，而是一种解释，即对史料做出有思想有见地的分析；借用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席勒化”，而不是“莎士比亚化”。面对同一史料，可能见仁见智，往往会有不同的解释。这或许恰恰就是历史令人着迷之处。哲学家波普尔指出，每一代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看待历史和重新解释历史。不同的历史解释往往蕴涵着不同历史学家独有的思想视角与价值评判，这就是历史的当代性，所以就有了克罗齐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将来的历史。不懂得过去，就无法理解现在；同样，不懂得现在，就无法理解过去。“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溯已往，阴也；理阐方来，阳也。”在一种普世价值之下，人类历史不可避免地趋向统一和一元化，不同文明在碰撞与交流中逐渐找到共识。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提供了一个美好的机缘，使所有的历史回到其最原始的起点，让人们用文明的眼光来打量历史，每一个历史都回到了人类史的大视野之下。

在古代的中国人看来，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这种夜郎自大的局限与狭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里指出：“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

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进入“现代”以来，西方中心论甚嚣尘上，西方文化就是历史的中心。当斯宾格勒在贫民窟的烛光下完成《西方的没落》时，汤因比在他 20 卷的巨著《历史的研究》中宣布：“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在汤因比看来，19 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 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 21 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汤因比一反国家至上的观念，主张文明才是历史的单位，因此而开创了一个历史新时代，一个超越“中心论”的全球史观诞生了。

现代全球史观认为，任何“文明”都不是孤立形成的，而是在不断碰撞和反复交流中进行拓展和改变自身的处境。早在近一个世纪之前，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就突破了国家和王朝的传统历史模式，以优美的文笔编写了一部统一的世界史。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令韦尔斯“对整个历史和缔造历史的普遍动力惊叹不已”。这部划时代的《世界史纲》问世于 1920 年，被译成多国文字，销量达数百万册。稍晚一个时期，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几乎重新改写了“历史”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他说他是“站在月球上看世界历史的”。这部被称为当今社会的“救世箴言”和“经典中的经典”的史书体现了近乎完美的现代历史观，整个世界被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它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各地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各种人类历史事件既是局部的，又在整体上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这部通史被认为是第一部由历史学家运用全球化观点囊括全球文明而编写的世界历史。

从《世界史纲》到《全球通史》，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基于历史全局观的分析史学已经彻底取代了叙述史学的传统模式。如果说斯塔夫里阿诺斯以一种地球视角树立了“文明史”的历史新模式，那么贾雷德·戴蒙德则像研究恐龙史一样研究人类史，他试图使“人类史”成为一门“历史科学”，从中寻找其直接原因和普遍原则，以及终极的确定性。相对而言，传统史学仅仅是叙述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又一个讨厌的故事”，从“那里可以得到的只是积累起来的资料，而不是装配和聚集好了

的成品”。应当说，历史只有从文献和叙述提升为分析和解释，它才成为科学。汤因比说，事实都是借助人的解释而展现的，不存在自然存在的事实。克罗齐也有类似的观点：史料本身并不会说话，历史学家使史料发挥出真正的作用，历史学家不是被动接受、考证和阐释史料，而是发挥巨大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去揭示出历史深处的东西。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历史的意义在于其承载的人类良知与智慧；罗马人和希腊人早已灰飞烟灭，但却在千余年后唤醒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精神，这就是历史的神奇。

作为中国历史作品的丰碑，《史记》被称为“无韵之离骚”。有趣的是，人们记住它是在语文课上，而不是在历史课上。如果说历史在中国更接近文学范畴的话，那么历史在欧洲则更接近哲学。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家有两件任务，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而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在启蒙运动中，伏尔泰和黑格尔先后发表了两个不同版本的《历史哲学》。汤因比倾毕生之力写作《历史研究》，“我深信，整体的历史观乃为当今世界切实所需”。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的范围不应局限于某一民族国家或某一时代，而应以“社会”和“文明”为研究的基本对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汤因比悲天悯人，着眼世界，旁征博引，文字典雅，堪为史家范式，甚至说由他引发了比较历史学的兴起。除了吴于廑先生，中国史家中鲜有放眼全球胸怀人类的历史大视野，这何尝不是一种历史的贫困。历史学家王曾瑜指出，历史超越了时间，因而对人类文明和良知的进步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个冲突与反智的疯狂时代，汤因比赋予历史学家一种神圣的使命：“帮助各大文明中的同伴互相熟悉，帮助他们了解并珍视其他文明的历史，将各区域文明的历史视为人类共同的贡献和共有的财富，从而消弭相互间的恐惧和敌对情绪。”

“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它总是偏袒一种坚强、自信而积极的生活，并给予它发展的权利。”从帝国到国家的历史嬗变构成人类历史上最壮观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迁。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因此提出“历史的终结”，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

遍史”。毋庸置疑，在人类文明谱系中，所有专制的历史与历史的专制都是封闭、内向、非正义和反文明的。从“天鹅绒革命”到“阿拉伯之春”，随着人类和历史的统一，传统历史都将不可挽回地走向终结，一个构筑在正义的普世价值观之上的平民化的人类大历史已经灿烂地展开，正如苹果公司的那句广告词——“这只是一个开始”。

“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根本是不重要的，说到底，最重要的事乃是个人的生命，只有它创造着历史，只有这时，伟大的转变才首次发生。”（荣格）民国时代，中国教育学家陶行知曾多次请翦伯赞给学生们讲历史，其初衷就是为了“给他们以做一个合格公民的知识”。毫不夸张地说，对于现代公民文化缺失的中国来说，“历史”是一条不可或缺的启蒙之路。“非历史专业写作者”张宏杰说过：历史更重要的功用在于“启蒙”。“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的未成年状态走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作为启蒙的“历史”应当是现代的“人类大历史”，而不应当是传统的权谋史和帝王史。一个将《资治通鉴》读过几十遍的人只能是一个宫廷阴谋斗争的高手，而不可能成为一个具备现代意识的人类公民。

历史不仅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也是人类的共同语言。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只有放在历史的背景下，才会显得高贵和伟岸。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在《历史》中说：“历史研究在真正意义上是一种为政治生活进行的教育和训练。……最有益的，或者说唯一的，学会在命运中保持尊严的方法就是记取前人的教训。”全球化时代的地球圈中，用脚投票的移民运动日渐加剧，每个民族和国家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的未来界限将越来越模糊，而不是越来越清晰。如同古老的地方志一样，传统时代的民族史和国家史都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斯大林曾说，希特勒死了，但德意志民族还在。实际上，历史比民族和国家更值得信赖，因为历史是永恒的。正如格林斯潘的一句话：“人性自古未变，它将我们的未来锁定在过去。”